岁月钩沉

路遥，我同学嫁的那个陕北青年

□ 邢仪

在我的印象中，最鲜活的路遥就是那个陕北青年。那个陕北青年路遥，中等个头，肩膀宽厚，走路的样子很有特点：稍稍斜着肩膀、低着头向前冲，活像是身后拉着一架犁。正应了陕北人对能人的说法：“抬头婆婊低头汉。”路遥有才气，满怀抱负，敢想敢做，比如他是延川青年第一个与北京知青谈恋爱的。

开始知道路遥是在林达与他交往之前，我们村一起插队的同学兰被抽调到县宣传队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她重新回到生产队后隔三岔五就会接到一封厚厚的来信，她趴在北京带来的大木箱上羞涩地看信，然后幸福地写回信。她突然变得那么地爱笑，一点小事她都觉得好笑，她的笑声像串串银铃飞出窑洞。我们听说那位男青年叫王卫国（就是路遥），是当时的县革委会副主任。兰在队里待的时间最短，一年后她就招工走了。听说兰离开延川后很快和路遥断了恋爱关系，原因是遭到了兰家长的强烈反对，他们的恋爱夭折了。我们队几个女生想象着路遥该是多么地难过和痛苦，于是就无端地牵挂起了陕北青年路遥，其实那时我们还没有见过他本人呢。

这以后，延川县委申书记大胆使用北京知青，林达被选到县委宣传部通讯组，我则到了县文化馆。路遥在县委大院与林达相识，不久路遥又开始和林达谈恋爱了。这下我们就对路遥更加地关注了，大家分析这路遥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本事和魅力，两个优秀的北京女知青都对他一见倾心，而林达更是我们在清华附中时的班长和才女呢。路遥和林达的恋爱一时成为延川县城里青年人热议的话题。

无奈，我们接受了自己的同学和陕北青年谈恋爱这个现实，并甘愿充当了他们之间的“媒介”。林达因工作常常下乡，我们这些知青干部则分散在各个公社，并经常来往于县城，路遥便委托我们传带书信。那时路遥信任林达的所有女同学，他交给我们的信并不封口。我和另一个女同学也就不客气地抽出信来“审查”（替林达把关），这次路遥写给林达的是一首自由体长诗，我们俩用挑剔的眼光边读边用红钢笔勾改我们认为语句不通的地方，结果好好一封信被我们像批改小学生作业一样，弄得面目全非。我们就这样把信交到林达手上，而她欣然接受。

陕北青年路遥有着极强的充实自己知识的欲望，他是文化馆阅览室的常客。上世纪70年代的延川县文化馆面山靠水，一个小院几孔窑洞，一间临街的半地下的阅览室。阅览室里读物少得可怜，空荡荡挂着为数不多的几份报纸和杂志，其实每天真正进来看报纸的人几乎没有，也就是每逢集日，会进来一两位老乡撂下些东西让我们帮忙照看。而路遥却能在里面待上整整一个上午。现在我就想，对于学习来说读物真的不需太多，能认认真真吸收充实自己就好。

印象中初恋时的路遥对林达的指示言听计从。有个叫彦的北京女知青爱着我们的同学——赤脚医生孙立哲，但好像出了点情况。作为好朋友，林达责成路遥去给孙立哲做思想工作。事后孙立哲总拿这事说笑：“路遥上关家庄找我来了，我不知他有什么事，路遥坐在那儿脸憋得通红，吭哧半天说出一句话‘彦这个人确实不错’。”孙立哲学着路遥的陕北腔，笑道：“路遥就不会做思想工作嘛，光说这么一句哪儿行啊？”

由于林达的关系，路遥渐渐融入北京知青的圈子。他交了许多知青朋友，我们也熟悉了路遥和他的家人。路遥的老家在清涧，因家境贫困孩子众多，路遥7岁时就被父亲从清涧老家带到延川过继给本家大伯。

路遥的大伯母自己没有儿女，对这个儿子倾注了全部的母爱。每到赶集的日子，这位矮小、朴实的妈妈都会挎着一个盖着毛巾的篮子，爬上革委会的高坡，来给路遥和林达送好吃食。往往没等路遥妈找见儿子，革委会大院的年轻人早都一窝蜂围住老人，抢先揭掉篮子上的毛巾，哇！红薯、玉米、白馍馍。

一年春节，路遥邀请我们去他家过年。大年初二，我和同为北京知青的伯梅一同赴约。冬天出门要等到太阳出山，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，拐进县城南边的一条山沟，十里地走了一个小时。路遥和林达站在村口迎接我们。

路遥妈把窑洞收拾得干净利落，明窗净席（炕席），新糊的窗纸上贴着窗花，热炕上已摆满待客的大红枣、南瓜子、炒黄豆和油馍馍。我们连说带笑爬上炕，玩了一天扑克，笑闹中第一次领略了路遥的妙语连珠和冷幽默。路遥大（养父）沉默寡言满脸慈爱，蹲在灶台后拉风箱。路遥妈看着儿子和准儿媳，看着准儿媳的北京同学，喜不自禁。她在灶台前和后窑掌不停地忙乎，然后从灶下给我们传递食物，几个人没下炕就连吃了三顿饭，直撑得打着饱嗝弯不下腰。那温馨的场景至今令我回味、令我感慨。

1973年，路遥几经挫折后考上了延大中文系，而林达没有参加考试。在路遥上学的几年里，她节省每月三十几元的工资资助路遥的学业。同年我也考上西安美院去上学了。毕业后我又回到延川县文化馆，见到林达和路遥还在恋爱（没结婚）。我的男友（现在的先生）每逢节假日都要来延川看我，于是我们和路遥、林达等几个朋友经常在一起吃饭，然后热火朝天地聊天，聊到高潮就开始唱歌。路遥给我们哼陕北道情，我们和路遥一起唱苏联歌曲。大家正是“恰同学少年”，我们谈论最多的是理想。

还是在林达那眼位于县委通讯组住宿兼办公的窑洞，烧火的土炕在后窑掌，办公桌放在窑洞窗前，女知青们奔拉着腿在炕沿上坐成一排，男人们或坐或站在书桌周围，路遥一手扶在桌子上，略弓着背，微偏着头，侃侃而谈，他壮硕的身体里充满着宏大的抱负。

终于，路遥和林达要结婚了，一场持续了六七年的恋爱马拉松就要冲刺了。这一天是1978年元月25号。他们的婚礼是县城文化圈的一件大事，轰动了上百人来送礼。那几天朋友们一起出动，布置新房的，筹备婚宴的，进进出出，忙里忙外。婚礼定在晚上六点举行，人们陆陆续续地来了，宣传部的贺陛在门口招呼着。路遥来了，林达姗姗来迟半小时，她穿了件深紫红色的棉袄罩衫，翻出浅粉色的内衣领子。女知青彦和孟霞陪在左右。文化馆的张仁钟担任司仪，两位新人在事先布置好的讲台后就座。讲台后的墙上正中是毛主席的标准像，两旁的对联编得不错，好像是



路遥和林达

一边“遥”什么什么，一边是“达”什么什么，桌子上摆着两盆开着小花的植物。首先由县文化局局长给新人佩戴大红花，贺陛代表宣传部讲话，李世旺代表来宾发言。最后是路遥代表林达致辞，路遥穿着件略显宽大的蓝布制服，新理的头发有些土气，但精神焕发。

可能是过于紧张，林达的脸色苍白，林达与路遥站在众人面前显得挺不自在，他们两人分别都向外拧着身子。有人提议，路遥唱歌林达和诗，但两位新人几经推托，最后不了了之。不知怎的，气氛就是出不来。简单走了这么几个过场，便开始宴客，新郎新娘巡回敬酒。一个小时后有人开始离席了，经多方筹备、多日操办的婚礼就这么没有悬念地结束了。说没有悬念，是因为我们在农村和县城见识了很多的结婚场面，众人玩闹得翻天覆地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年轻人玩不到的，那样的热闹着实令人期待啊！

七十年代末路遥走出了陕北。那个陕北青年路遥的样子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。在陕北青年中，有才气的人很多，有抱负的也不少，路遥的不同是他的实干。路遥出生和生长于社会的最底层，饱尝饥饿和贫穷，他立下奋发之志，他要挣脱命运的安排，他选定了文学之路以出人头地，文学是他的道路也是他的目的地，他的道路和他的目的都是为了一件事：那就是记录和歌咏那块养育他的、贫瘠的、让他又爱又恨的陕北大地，和那块大地上的劳苦的乡亲们。路遥豁出自己的性命来，在文学的道路上朝目标疾跑。

似水流年

王石凹往事

□ 詹艳莉

一句厮跟上，父母随着老乡一起从河南来到了铜川王石凹煤矿，那是国家“一五计划”的重大项目之一。

人说记忆像河流，一条季节的河流，时而奔涌，时而干涸，时而冰封。欢乐忧愁，五味杂陈，但是半个世纪过去，一想起王石凹煤矿，喜悦从心底涌出，满是美好，那里是我的出生地。

王石凹煤矿——一座苏联专家援建的大型煤矿、铜川矿务局最大的煤矿、西北五省最大的煤矿，从我记事以来，就听父辈们常常念叨。煤炭是国家最重要能源支柱，能够在这样大的矿工作，充满自豪，无比骄傲，无上荣光。

王石凹煤矿地处过去的郊区鳌背村，三面环山，矿山人称东山、西山、北山，南面是一条山沟。蜿蜒起伏的公路沿着山沟通往铜川市区，一条长长铁路连接到市区经咸铜铁路可达连云港。据说当时矿工家属的两万人，分散居住在三座山头上的一排排兰瓦红砖平房里，我家住在北山。

北山是一道比较宽的山梁，属于煤矿的生活区域，粮站商店蔬菜门市部压面房学校医院照相馆理发室都在这里，人们的生活之需皆来自此处。

山下就是井口，一口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竖井，通往山下煤矿，靠一部绞车。几条很粗的钢丝绳被固定在山上山下，一排排角铁焊接的带着滑轮椅子横亘其上，绞车开动，咣当咣当地下滑，片刻就到了山下，矿工们每天穿行其间。若是遇到停电故障，就只能顺着旁边窄窄的坡路步行。

矿工的孩子们都坐过这部绞车，第一次都是无比新鲜。坐绞车不是找爸找妈就是去山下看电影洗澡等。山下有井口、选煤楼，也有职工宿舍、洗澡堂和矿工俱乐部，那里藏着丰厚的煤炭，更有多彩的文化。

现在绞车做了改进装了车厢，之前是没有的，就一个椅子，可以看见前面的滑轮。每次坐都要屏住呼吸，一条铁链就是保护，拉着铁链直摇晃，只能使全力靠紧椅背，稍有不慎坠车而下，危险得很。一听说过摔下去的人或残或死，就会恐惧很久不再去坐车。

坐车下去，可以到母亲所在的选煤楼。一条长长的皮带拖着煤块，妇女们穿着毛蓝色的工作服，灰头黑脸戴着被煤染色的手套飞快地拣出铜核。铜核散着蓝绿光比较光滑，掂起来也沉重些，挑选靠经验，否则就把好煤扔了。这里产的煤多是焦瘦煤，质量优良，热卡极高，适合发电厂和炼钢厂燃烧。

选煤楼连着澡堂，每次换了水，妈妈们催着孩子们赶紧进去洗澡。要是晚一点，女工们一下班，几个下去一扑通，整个水池乌黑。奇怪的是，那么黑的水一洗，出来都是一张张白净的脸。

为啥要说过去的郊区？铜川建立之初不分区县，只有城区和郊区。城区相当于现在的王益区，是市委、市政府所在地，而郊区就是十几个煤矿所在区域，连接各个煤矿的是铁路。那个时候，有铁路的城市不多，而铜川处处都有，整个城市没有汽车的地方却有火车，四通八达。因为有煤有矿，后来同关县撤县设市了。

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，赶上了人口生育高峰，家家都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。1972年上小学，同年级18个班，我分到15班，每一班50多名同学。有同学说，是因为我们赶上了秋季改春季招生。

上课手背后，端坐起身，目光直向老师，那是聆听的姿态，饱含着对知识的渴望，一切未知似乎都在老师的教鞭当中，心神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

写作业没有觉得苦，拼音生字抄一行就行。整个一年级充满欢乐，从未因作业烦恼。而现在的孩子在减负声中依然不堪重负，同样的童年，不一样的感觉。羡慕现在孩子可以广泛的阅读，而我们只有课本没有那么多的课外书，更没有电视网络手机微信，作业写完东家串西家，只剩一个玩字。

每个学期，学校都要组织参观霸王窑，开展忆苦思甜教育。黑漆漆的霸王窑井口只有一个辘轳那么宽，容得一个人的宽度，下面深不可见，矿工靠的是一只煤油灯，背着一个筐，趴在巷道用镐挖煤。那是地主阶级剥削受苦人的见证，每一次参观后，同学们都紧握拳头、咬紧牙关。

回首过往，记忆也永远新鲜。曾经的一切日渐远去，王石凹煤矿遗址公园已建成，修缮的职工宿舍俱乐部维持原貌，选煤楼喷上了蓝色的漆，绞车做了改进装上了车厢，设立了可以避雨的站台，旁边修了水泥台阶，那些铁路依旧在卧。

而山上的学校几经重建，教学楼拔地而起，宽敞明亮的教室、平整如新的塑胶跑道，记忆的平房教室无影无踪，那群无忧无虑的孩子也到了南北各地。

沿着那条还在的主街道，试着走向曾经的家，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淹没了回家的路，曾经的熟悉变陌生。多想遇见一个熟悉的面孔，谁知皆是路人，那些房子多年前已经拆了。

街心公园，摇曳的波斯菊五彩缤纷，冬青树植篱整齐新剪。我的脑海里却是山上黄色紫色的满天星，还有一片片黄刺玫和它们如玛瑙般红亮的果实，吃起来甜甜，串成手链项链美美。

认识一座城，还需深入了解这个矿。因煤建市、因煤而兴，资源枯竭，虽是过往，那些亲历者的记忆依然鲜活。感谢王石凹煤矿工业遗址公园留住了一代代矿工及子弟的永恒记忆，那是一段载入史册的华章。

文史馆的故事

曹谷溪先生捐赠陶牛入藏记

□ 任强

展柜里，一件陶制器物静静伫立。这是一组牛拉车陶器，通体灰褐，造型古朴——牛首微昂，四足稳健，脊背浑圆如弓，身后拖着一辆双轮车厢，车顶之上，四只小兽昂首蹲踞，形态各异。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，却掩不住那股倔强而沉静的力量。它不像现代工艺品那样精致，却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原始生命力。

这件珍贵藏品是著名诗人、作家曹谷溪先生捐赠给省政协文史馆的。据曹谷溪先生介绍，上世纪80年代，他在秦直道采风时路边淘得此物。器型是典型的汉代风格，车顶上的四只小兽，难辨是龙还是蛇。它的到来，不仅丰富了我馆的馆藏，更让我们得以透过这组小小的陶器，窥见陕北高原上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，以及一位文化老人对故土的深情守望。

曹谷溪的“牛”缘

曹谷溪是陕北文化的“活字典”，是作家路遥文学上的引路人，更是一位一生扎根黄土地、用笔墨为陕北立传的文化老人。

文史馆开馆之初，我们向各界征集文史资料和文物。曹谷溪先生珍藏此物多年，却一直未能寻得合适的归处。正是宝塔区政协主席魏恒从中牵线搭桥，他深知曹谷溪先生与这件陶牛拉车的深厚情缘，也了解文史馆存史育人的使命，多次登门沟通、反复协调，最终促成了这段“入藏佳话”。可以说，没有魏恒同志的牵线，这件陶器便到不了文史馆。

牵线成功之后，这件承载着厚重记忆的陶器如何从延安来到西安，同样经历了一段让我至今难忘的历程。我深知此物的珍贵，也感念曹谷溪先生的一片赤诚，便亲自带队，与馆藏部负责人满杨、见习生张星楷一道，专程驱车前往延安，登门拜访曹谷溪先生。在曹老家中，我郑重地接过他珍藏了数十年的器物，满杨仔细查验器型、记录信息，张星楷则在一旁拍照、登记造册。

整个交接过程简朴而庄重，曹老抚摸着车顶上那四只神态模糊的小兽，喃喃道：“跟了我几十年了，今天交给你们，我心里踏实。”临行前，他还特意叮嘱我：“这车顶上的四个小东西，我琢磨了半辈子也没弄明白到底是龙还是蛇，你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，弄清楚了告诉我一声。”

回到西安后，这件陶牛拉车正式入藏我馆。从魏恒主席的牵线搭桥，到我们一行人专程登门，每一个环节都饱含着对文化的敬畏、对捐赠者的尊重。

一件陶器里的陕北农耕史

陶牛拉车，汉代前后最多。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强盛时代，也是农耕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。陕北地处黄土高原，沟壑纵横、土地贫瘠，勤劳的陕北人民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耕耘，创造了独特的农耕文化。

牛车作为汉代常见的运输工具，既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，也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望。这头陶牛造型简练、线条粗犷，没有过多的装饰，却准确地抓住了牛的神韵——倔强、坚韧、沉默而有力。

不知道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件藏品依然保持着它当年的姿态。它的身上凝聚着汉代工匠的匠心，也凝聚着陕北农耕文明基因的传承。我们站在它面前，仿佛能听见两千年前的牛铃声声，能看见黄土高原上的农夫驱车运粮的身影。

曹谷溪的文化守望

曹谷溪先生对这件陶牛拉车的珍爱，源于他对陕北文化的深厚感情。他自称是陕北的儿子，一生都在为陕北立传。他的诗作《陕北》中写道：“陕北，我的陕北/你是黄土高原上的一颗明珠/你是黄河岸边的一棵老树/你是信天游里的一腔热血/你是老镢头下的一片深情。”

他曾说：“陕北的文化，就像这黄土地一样，朴实、厚重、深沉。它不张扬，却有力量；它不华丽，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”

这件陶牛拉车，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物化。它不精致，却有力量；它不华丽，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这和曹谷溪先生笔下的陕北一样，朴实而深沉、沉默而有力。而那四只至今身份成谜的小兽，更像是陕北文化的一个隐喻——有些东西，不必一一说破，留一点悬念，反而更有味道。

从个人珍藏到公共记忆

如今，这件陶牛拉车静静地陈列在我馆的展厅里。它不再是曹谷溪先生个人的珍藏，而成为三秦大地共同的记忆。每天都有参观者在这件陶器前驻足，有人赞叹它的古朴，有人感叹岁月的沧桑，有人从它身上看到了陕北农民的身影，有人从它身上感受到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厚重。更多的人会好奇地追问：车顶上那四个小动物，到底是龙还是蛇？

文史馆的使命，正是要让这些文物从私人珍藏走向公众视野，从历史的角落走向时代的中心。曹谷溪先生的捐赠，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信任和支持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——传递对故土的热爱，对文化的敬畏，对历史的担当。而这其中，离不开魏恒同志这样的牵线人，也离不开满杨、张星楷这样的文史工作者——正是我们一棒一棒接力，才让更多像陶牛拉车一样的珍贵记忆，得以从“私藏”变为“公藏”，从个人手中交到后人眼前。

这件陶牛拉车是陕北农耕文明的见证，是曹谷溪先生文化守望的见证，也是政协文史工作“存史、资政、团结、育人”的生动实践。它让我们看见：文化传承，从来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用行动书写的真实。就像这头陶牛一样，它沉默无言，却诉说着两千年的故事；它质朴无华，却承载着永恒的精神。而那四只身份成谜的小兽，则是一道留给后人的谜题，静待有心人继续探寻。